

我敬爱的父亲——凌彬在华校任教33年

作者：凌妍（上）

我父亲凌彬在印度尼西亚邦加岛栢港中华学校任教33年。他对侨胞的教育事业无限热爱，工作认真严于律己忠厚待人，深得侨胞们的爱戴和赞誉。

父亲1905年出生于印尼邦加岛烈港的矿工家庭，我的曾祖父凌官仁及其两个兄弟在满清时代被卖猪仔漂泊越洋，由广东蕉岭到印尼邦加岛的。祖父凌辛安以及他们的两代祖辈都是矿工，终身过着奴隶般的劳工生活。祖父干活勤奋后被荷兰矿主提升为“巴力头”。他吃尽荷兰人剥削的苦头，加上中国贫穷落后的环境影响，认为中国人想要出人头地，必须要学习西方文化读洋书，因此祖父把父亲送往烈港的教会学校读荷兰书，而父亲自幼目睹祖辈的悲惨生活，激

起对荷兰殖民统治者的仇恨，一股不愿做奴隶要自强不息的爱国心使他不肯读荷兰书，在被迫读了几年洋书之后，他毅然只身到栢港去读中国书，为此他与祖父闹个天翻地覆。记得小时候听父亲说，他每月骑自行车回烈港都要为生活学习费用与祖父吵架，最后的结果总是祖母偷偷摸摸地把自己不多的私房钱给了父亲，所以父亲对祖母的感情远比祖父要深得多。

1923年父亲18岁时经千辛万苦终于把中文读到毕业。开始了33年作育英才的教师生涯。致力教育，默默耕耘桃李满天下。

父亲一生自强不息勤奋好学，他画得一手好画写得一手好字，他在栢港小学担任数学和图画课兼任训导主任，素以讲课

深入浅出作风认真严厉著称，为当地教育界社会颂传。调皮的学生都敬畏他，乱哄哄的课室只要有人说一声，凌先生来了，马上就安静下来了，只要他在教室外的窗前或门口站一下，捣蛋的学生马上就收敛了。调皮的学生小时候恨他，长大后都敬爱他。当年最调皮的学生之一如今为香港邦加侨友会永远名誉会长的彭建先生深情地说：“以前因为没交作业或背不出书不知挨了凌先生的多少板子、挨罚站了多少次，严师才能出高徒啊！”由于他任教时间长，邦加的许多家庭，两代人都曾经是他的学生。父亲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尤其回国以后侨友们聚会，一说起来很多人都是父亲的学生，不少人担任了党政领导职务或专业技术负责人，颇有成就。为此，父亲很感安慰，也为他的学生成才而骄傲。父亲致力于教育默默耕耘了33年，他得到广大学生的爱戴和学校的尊敬。1951年父亲服务中华学校25周年时（除了抗战拒教外），全校师生举行了隆重的庆典仪式，他是继

中华学校的创始

人之一赖官林校长、张鸿南先生之后第三位获学校表彰授予殊荣最老资格的老师。为此，父亲获学校一块纪念手表。在父亲教龄满三十年时，当地教育界及社团民众为表彰父亲长年教书育人忠于职守业绩感人而举行隆重的嘉奖大会，把刻有“教育之光”四个大的锡怀授予父亲，场面动人，此锡怀成为我家引以自豪的珍藏品。

热爱祖国追求光明拳拳赤子情

父亲非常热爱祖国，虽身居海外仍念念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学校爱国人士组织抗日募捐，父亲是活动积极分子，他多次组织募捐奔走串联支援抗日。邦加被占领后，日军命令所有教师回校接受培训对学生施行奴化教育，父亲拒不报到，带着全家躲到勿索村，不为日本人服务，为此父亲被日本人列入黑名单，据说日军在栢港机场附近挖了大坑准备进行集体屠杀，幸亏时局急转日本投降，这批爱国人士才幸免于难。

日军占领时期，

勿索村自发成立自卫以，父亲被推举为村长，当时食物非常短缺，父亲为解救难民，变卖了祖父存下的数千斤锡渣，冒险到新加坡购买大米回村，深得村民的拥戴。在日本占领时期，勿索村海边住着一位寡妇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度日饥不择食，他们在海边误拣渔民扔掉的毒鱼煮汤吃而全家中毒，父亲获息后马上把他们四口送到医院抢救，那寡妇和稍大女儿因中毒太深而不治，剩下幼小女儿无人抚养，父亲把她带回家中，取名凌仙供养读书，成为我们兄弟姐妹中的一员，直到她成家。

父亲非常热爱祖国，他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欢欣鼓舞。1952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我大哥初中毕业非常向往新中国，向父亲提出回国读书的要求，当时我家兄弟姐妹6个，靠父母任教维持生计，生活相当清苦，但父母千方百计向亲友借钱筹足盘缠把大哥送回祖国深造。为了哥哥姐姐日后能接着回国读书，父亲用业余时间开辟了一块胡椒园，用胡椒园的收成



邦加岛图